



引发人类史上第一次金融危机的郁金香

□王雪

郁金香是一种球根花卉，又名洋荷花、草麝香，是荷兰、土耳其等国国花。它色彩丰富、花形优雅、植株奇特，被誉为最具观赏和应用价值的花卉之一。

（一）

荷兰郁金香闻名全世界，但郁金香原产自中亚。它盛开在帕米尔高原树丛中，一路蔓延到天山脚下的山谷之中。公元10—11世纪，土耳其人沿着丝绸之路经过此地，发现这种形状像他们头上戴的头巾的花，将它带回本国后大量种植。郁金香的英语植物学名“tulipa”正是来自土耳其人给它取的昵称“tulband”，即“穆斯林的头巾”。

1453年，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攻占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在更名后的首都伊斯坦布尔王宫花园里大量种植郁金香，使郁金香成为皇室标志。

1554年，奥斯曼帝国苏丹苏莱曼一世把郁金香球根作为礼物，送给来自维也纳哈布斯堡帝国的大使比斯贝克。这位大使回国后，将自己从伊斯坦布尔带回的一些郁金香球根送给从事植物学研究的好友克鲁修斯。1593年10月，克鲁修斯受聘于荷兰莱顿大学，在植物园中进行郁金香培育，并大获成功，因此被誉为“郁金香之父”。

郁金香这种富有异国情调的花卉引起当地人的兴趣。可是克鲁修斯却只让看但不让卖。他的做法导致当地人不满意，一些人潜入植物园偷走大量郁金香球根进行买卖。这客观上促进了郁金香在荷兰的广泛种植。至此，郁金香完成了从中亚经土耳其到维也

纳，再到荷兰的传播。

（二）

17世纪是荷兰历史上的高光时刻，被称为“黄金时代”。财富的急剧膨胀潜伏着巨大危机。

郁金香从植物园被盗出后，很快卖入富人家中。紧接着，人们发现郁金香球根会被一种病毒感染，感染后的郁金香花朵变异成新品种，在色彩上出现神奇变化，有了变幻莫测的美。这导致一种新社会风气慢慢形成，拥有稀有奇异的郁金香品种，被视为财富与荣耀的象征。随着需求剧增，市场上郁金香球根交易越来越频繁。由于郁金香繁育周期长，短期无法提高产量，供不应求导致价格疯涨。

这种现象使人们意识到，倒卖郁金香可以一夜暴富，于是更多投机者参与进来。据记载，当时在阿姆斯特丹，一个普通人从事4个月郁金香投机，就能赚6万荷兰盾。而当时荷兰一位熟练工人一年的薪金却只有300荷兰盾。在1634年之前，只有专业人士和富人参与郁金香的竞价和销售，却在这一年开始发生了改变，纺织工人、门卫、理发师、清道夫、煤矿工人，甚至还有大量的学生也参与进来。人们聚集在小酒馆里，通过图片和品种目录进行交易。一株郁金香球根一天之内可被易手十次，但是它的真身还在第一个卖家的仓库里。1636年，一株稀有的郁金香售价达到了与一辆马车、几匹马等值的地步。最著名的“永远的奥古斯都”郁金香球根价格在1633年是5500荷兰盾，到1637年1月涨到10000荷兰盾。这个价格足够买一栋昂贵的阿姆斯特丹运河边豪宅。

河边豪宅。

郁金香价格持续上扬，吸引许多人从欧洲各地带来资金赶到荷兰。外国大量资本流入荷兰，给郁金香交易火上浇油。1637年新年前后，郁金香期货合同被炒得热火朝天。但到了2月份，随着郁金香花期临近，一些商人意识到这个现象的荒谬，信心动摇便开始抛售手中的郁金香球根期货。多米诺效应开始了，把毕生积蓄和住房都押在了这些球根上的人们纷纷抛售。短短几天，郁金香球根价格跌到之前的1%，昔日繁华之地顿时变成了逼债逃债的地狱。尽管此时荷兰政府强势入市，希望以10%的价格回购，来阻止崩盘，但暴跌已不可避免，千百万人已倾家荡产，全国经济一片混乱。这次事件史称“郁金香泡沫”或“郁金香效应”，成为人类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金融危机，使荷兰陷入持续数年的经济萧条，加速由一个强盛的殖民帝国走向衰落。

荷兰郁金香交易崩盘后，本国商人开始向国外出售贬值郁金香球根，使得郁金香在世界贸易中得以幸存。19世纪，随着蒸汽机和蒸汽抽水站的发明，郁金香种植不再受水涝威胁，确保了产量，价格也因此下降到合理水平，其球根开始销往欧美各地，许多不同社会阶层的人都开始理性购买郁金香。

（三）

人们对郁金香的追求，促进了郁金香文化的发展。

1718—1730年，这一时期土耳其社会和平稳定，人们生活相对安逸舒适，郁金香逐渐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因此这一时期被称为“郁金香时

苏轼不仅是北宋的文坛巨擘，还是一位治水能臣。2019年，水利部公布了12位历史治水名臣，苏轼名列其中。苏轼有丰富的治水实践：任杭州通判时修复钱塘六井，任徐州太守时固堤抗洪，任杭、颍太守时修治境内沟洫，谪居岭海时治湖、修桥、引泉、凿井，撰写了《熙宁防河录》《禹之所以通水之法》《钱塘六井记》等水利文章，举荐了单等水利人才，倡导“兴天下之水学”，为北宋的水利建设作出过重要贡献。苏轼的治水之道以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为原则，以注重民情、保障民生为宗旨，以因势利导为方法，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代的治水智慧，彰显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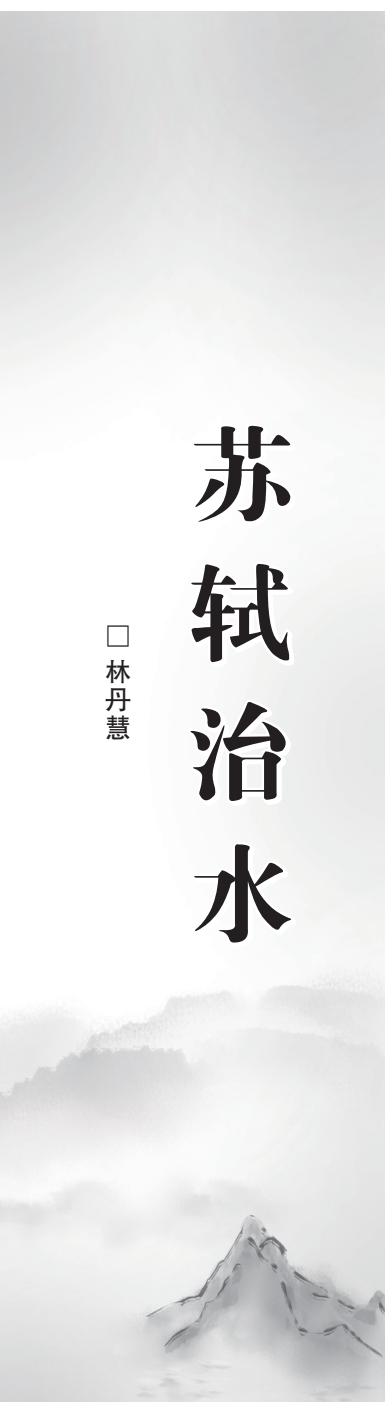
以恢复、保护为原则，激发河流生命活力

苏轼言：“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这里的“理”是指河流的自然之理。苏轼认为，治河的关键是顺应河流的自然之理，保护河流的自然生命。生态空间是河流生命的基础。苏轼指出：“吴中本江海大湖故地，鱼龙之宅，而居民与水争尺寸，以故常被水患。”深刻揭示了水患的根源在人过度挤压了水的生态空间。因此，他提出“堤防省而水患衰”的理念，主张通过减省堤防让地与水来根治水患。流速是河流生命活力的体现。苏轼指出，近年吴中水患加剧是松江壅滞所致。松江是三吴之水流注东海的咽喉要道。在自然状态下，江水迅驶，能够自行涤去海口泥沙，保持水道畅通。自庆历以来，政府为漕运之便，在松江上筑长桥挽路，导致江流减缓，海口淤积以致毁灭，三吴之水难泄，故吴中多水患。苏轼认为，应渐挽路为千桥，腾出两千丈桥拱作为疏水通道恢复自然江速，保证江水涤沙有力，从而减轻吴中水患。蓄水量也是河流生命力的重要体现。在唐代，杭州西湖深阔，能灌溉千顷良田。至北宋时，由于官员疏于治理、民众盗湖为田，致使西湖干涸生蓍。元祐时期，西湖已堰塞近半，早期无益灌溉，涝期流溢害田。苏轼向朝廷上书治理西湖，指出西湖对杭州的五大重要作用，他说：“西湖之利，上自运河，下及民田，亿万生聚，饮食所资，非只以为游观之美。”恢复西湖的水量不仅是对西湖生命的保护，也是对杭州整体生态系统的保护。苏轼呼吁：“使杭州而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西湖开葑后，苏轼制定了一系列管理条例。我们现所熟知的“三潭印月”原是苏轼划定的一条“生态红线”，以湖面小石塔为标界来监测水位和水面种植区域。明代《西湖游览志》言：“自是（苏轼除葑）西湖大展，至绍兴建都，生齿日富，湖山表里点饰繁，离宫别墅，梵宇仙居，舞榭歌楼，形影罗列，丰媚极矣。”直至今日，西湖依然是杭州发展的重要支撑。

苏轼指出：“人知江河之有水患也，而以为沼沚之可以无忧，是乌知舟楫灌溉之利哉？”治水不是要遏制河流的生命，而是要顺应河流的自然之理，恢复其自然生命，通过激发其生命活力来实现人民生活的改善和社会财富的增值。

以民情、民生为宗旨，让河流之利普惠大众

苏轼治河的另一关键是“酌之以人情”，即顺应民情、注重民生。首先，苏轼总是顺应民情而兴治水利。熙宁时期，杭州钱塘六井废坏，为解决“民求水而不得”的问题，苏轼协助太守陈襄修浚六井。熙宁十年七月黄河决口，八月水及徐州城下。苏轼亲率兵民修城固堤，护一城生齿，受到神宗褒命。为防洪水再来，苏轼请调役夫增筑城墙，创设木岸。元祐四年，苏轼知杭州，因民众反映“惟苦运河淤塞”，故浚治运河。次年杭州灾荒，苏轼应百余父老交民陈状，请奏朝廷以工代赈开葑西湖，“兴久废无穷之利，使数千人得食其力以度此凶岁”。元祐八年，苏轼力阻无效的八丈沟工程，减轻民众负担。同年颍州灾伤，苏轼兴修沟洫助民度过凶岁。其次，苏轼的水利工程设计以便民、惠民为宗旨，充分考虑人民的生活需求。例如，在元祐时期的杭州水利工程中，苏轼扩大了西湖的供水区域，并于城中多处作石柜贮水，“使民得汲用浣濯，且以备火灾”。葑泥筑成的长堤贯通南北岸，解决了民众“环湖往来，终日不达”的交通问



□林丹慧

题。苏轼谪惠时，以竹管引山泉入城中，解决了百姓饮水安全问题。他还出资建桥，解决民众覆溺之忧。由此可见，苏轼充分认识到良好的环境是民生的重要内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才是合理的生存方式、发展方式，他兴治水利时充分注重民情，把保障民生、普惠大众作为水利建设的宗旨。

以因势利导为方法，因地制宜、化灾为利

“因时之势”是苏轼治水的重要方法。他善于利用自然节律、生物规律来推进水利工程，往往能以小成本博大效益，化灾伤为兴利。以苏轼在元祐时期开展的杭州水利系统工程为例，日纳江湖而淤积江沙，运河频频开浚致使杭州社会失序、环境污染，若不及时浚治又致漕运壅滞、经济受损，是困扰杭州几十年的重大民生问题。经过实地勘察与分析，苏轼设置了一堰相隔绝茅山河与盐桥河，每遇潮上则暂闭此堰，令江湖只入茅山河，“候一两时辰，潮平水清，然后开堰”，使清水入盐桥河。这样便使流经城区的盐桥河免去了开淘之患，而茅山河多流经人烟稀少的郊区，纵复淤积开淘，亦不扰民。此处，苏轼利用了潮水涨平、泥沙淤垫的自然规律，只用一堰，便解决了盐桥河的淤塞问题，极大减轻了浚治成本和扰民之患。彼时正值灾年，苏轼趁机乞奏朝廷募民开湖，既解决灾民生计又兴修水利，可谓因势利导，化灾为利。苏轼择定四月底兴工，据苏轼《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所言：“（四五月）浙中梅雨，葑根浮动，易为除去。及六七月，大雨时行，利以杀草，芟夷蕴崇，使不复滋蔓……八月断葑根，则死不复生。”可见，苏轼是按物候规律推进工程进度的。苏轼还在规定湖区募民种麦，利用菱角每年都要“苴除涝渍，寸草不遗”的种植方法抑制葑田形成，同时收其利以备修湖。苏轼还用废弃葑泥筑堤以通行者。堤上夹道杂植花柳，既加固土堤，又美化环境。从南宋开始，苏堤春晓便是西湖十景之冠。

在该系统工程中，苏轼充分结合自然节律与物候规律，因势利导、因地制宜，达到了化灾为利、变废为宝的效果。苏轼言：“陂湖河渠之类，久废复开，事关兴运。”水利建设事关国家兴衰，这样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依然不过时。



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提出与确立

□左凤荣

对时代的认识与判断，是重大的战略判断，也是一个国家制定内外战略的重要依据。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明确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新论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中国共产党便开始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审视国际局势和中国对外关系。从1977年起，国家派出了不少代表团出国，了解外面的世界，仅1978年就有13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国家领导人21次率团出访，到达51个国家，其中邓小平本人先后四次出访了8个国家，包括日本和新加坡。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令人震惊，从中也看到了我们的差距。

随着改革的发展，需要改变过去固有观念，对国际环境作出更为科学明确的判断。1983年3月2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领导人谈话时强调，“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该上的要上”。当时冷战还没有结束，但邓小平敏感地看到了时代发展进步的潮流，认为发展才是关键。1984年12月19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说：“毛主席在世时和整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头一二年，我们强调战争的危险，现在有了些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感觉和平的力量发展壮大，不仅是第三世界，而且东欧、西欧都反

对战争。”1985年中国主动宣布裁军100万，并建议有核国家就不使用核武器，停止核试验、停止核生产达成协议。

1984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提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靠南北对话，但这还不行，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1985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再次强调，“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南北问题是发展问题，是核心，发展问题解决得越好，世界和平就越有保障。这一判断准确把握了国际局势变化的关键。

和平与发展正式被党确定为时代主题。1987年10月25日党的十三大召开，大会总结了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在这短短的9年时间里，中国发生了深刻变化，

经济建设成就尤为突出。1986年同1978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国家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平均收入水平都大体翻了一番。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根据国际形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围绕和平和发展两大主题，调整外交格局和党的对外关系，发展了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对外政策。我们在国际上的朋友更多了”。明确把和平与发展确定为时代主题。

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国家要强盛，必须跟上科技革命的潮流，抢占发展的制高点。为了赶上时代发展，我们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赢得了主动。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到20世纪80年代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中国共产党所确定的发展目标，不仅要实现国家强盛，更要改善人民生活。1978年我国人均GDP仅为381元人民币，是典型的低收入国家，但改革开放政策实行没几年，中国人便解决了吃饭问题。从1978年到1990年，中国的GDP增长了4倍多。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贫困人口累计减少7.4

亿人，贫困发生率下降94.4个百分点，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2021年在建党百年时，我们实现了小康目标，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确定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中国坚定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处理国家之间关系问题上，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决定亲疏好恶，而是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态度和立场。中国高举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旗帜，注意把反对霸权主义与发展国家间正常关系区分开来，首先改善了与发达国家的关系，1978年8月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邓小平强调，“中国人民深信，把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经济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先进经验结合起来，对于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以争取和平为目标的中国对外政策，积极发展与各方关系，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外部环境。

实践证明，对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我们制定正确的内外战略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